



[荷]耶勒·费舍 安东·黑姆耶克 /著

张文成 /译

20世纪80年代,荷兰被认为“病夫”、“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就业失败者”。但是,在劳资双方、中左与中右力量共同努力下,10年后的荷兰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就业成绩更是被誉为“奇迹”:1997年荷兰的失业率仅为6%,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将失业率减少一半的国家。于是,荷兰再次引起广泛的国际注意,围绕“荷兰奇迹”出现了一场国际大讨论。本书是两位荷兰学者对“荷兰奇迹”的解释。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 荷兰的奇迹:

## 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法团主义

*Helan de Qiji: Helan de Jiuye Zengjia Fuligaijie Fatuanzhuy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荷] 耶勒·费舍 安东·黑姆耶克 / 著

张文成 / 译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 荷兰的奇迹：

## 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法团主义

*Helan de Qiji: Helan de Jiuye Zengjia Fuligaige Fatuanzhuy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 Dutch Miracle by Philip Whyman*

Copyright © Philip Why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阿姆斯特丹出版公司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兰的奇迹：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和法团主义 / [荷] 费舍, [荷] 黑姆耶克著; 张文成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151-3

I. 荷… II. ①费… ②黑… ③张… III. ①劳动市场—研究—荷兰 ②社会福利—福利制度—体制改革—研究—荷兰 IV. F249.563 D756.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9283号

版贸核渝字（2006）第3号

### 荷兰的奇迹：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和法团主义

HELAN DE QIJI:

HELAN DE JIUYE ZENGJIA FULI GAIGE HE FATUAN ZHUYI

[荷] 耶勒·费舍 著

安东·黑姆耶克

张文成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玮

责任编辑：杨亚平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蒋忠智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5 字数:217千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 总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 1951 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 19 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的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



社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的 13 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 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 20 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 5 种);1994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 前 言

过去的一年,荷兰的政治经济已经成了一个奇迹,有时甚至让外国观察家感到嫉妒。国际一片喝彩的关键是就业奇迹。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解释荷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严重的失业危机奇迹般地走向 90 年代就业的创纪录增长的复兴历程。

刺激我们写作本书的最初冲动,来自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是他分别邀请我们二人在 1996 年秋天前往德国科隆,就荷兰劳资关系和福利改革的新情况在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作了两次讲座。在我们讲课的过程中和结束后,沃尔夫冈、研究所的其他主任雷娜特·迈因茨(Renate Mayntz)和弗里茨·沙尔普夫(Fritz Scharpf)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为我们潜心破解荷兰的就业增长与福利改革之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国际社会对荷兰赞不绝口的大背景下,我们将两人的笔记转化为一份合作论文的计划在 1997 年初扩展成了一个全面的项目,当时,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家萨斯基亚·德弗里斯(Saskia de vries)与我们联系,适时地提出了撰写一本关于“荷兰奇迹”的著作的要求。这一下加快了我们的最初计划的进度,并且给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荷兰近些年来和社会和经济决策,包括整个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愿望提供了动力。

1997 年春天和夏天,在萨斯基亚·德弗里斯及其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各位主任亲切而热情的款待下,我们两人得以在科隆相聚。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把我们的想法变成一本书。过去半年中,我们一直沉迷于本书的写作,不问他事,而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同事对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莫妮卡(Monika)和埃姆克(Emke)对这个吸引人的项目的热情与支持。

在试图将荷兰的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艰难困苦联系起来时,我们立刻遇到了荷兰法团主义的复杂性问题。由于本书表现了法团主义在国际约束增加的情况下具有进步性的观点,我们决定将本书奉献给我们的老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和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他们两人现在都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工作,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由衷感激,感谢他们使我们认识了现代欧洲政治经济体引人入胜的多样性。

这一项目的思想演进极大地得益于弗里茨·沙尔普夫、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维尔纳·艾希霍斯特(Werner Eichhorst)、贝尔纳德·埃宾豪斯(Bernard Ebbinghaus)充满鼓励的批评性评论和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期间与菲利普·根舍尔德(Phillipp Genscheld)的不断讨论。过去几年,我们与很多荷兰学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上进行过合作,我们要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深表感谢。他们是:本·范德布兰德(Ben van de Brande)、扬-谢斯·赫尔德曼(Jan-Kees Helderma)、彼得-扬·容根(Pieter-Jan Jongen)、基斯·范克斯伯亨(Kees van Kersbergen)、罗伯特谢斯·克洛斯特曼(Robert Kloosterman)、马克谢斯·范德梅尔(Marc van der Meer)、莫里斯谢斯·罗赫(Maurice Rojer)、约里斯·范勒伊斯维尔特(Joris van Ruysseveldt)、扬-彼得·范登托雷(Jan-Peter van den Toren)和罗姆克·范德费恩(Romke van der Veen)。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荷兰政府社会事务与就业部的埃里·范克(Ellie van Kooten)和埃尔斯·弗格尔斯(Els Vogels)。在这个国家这个世纪可能最炎热的8月,埃里始终如一给予我们帮助,向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和富有启发性的批评。一如平常并且感到遗憾的是,本书的有关事实和判断错误完全由我们负责。

耶勒·费舍和安东·黑姆耶克

1997年8月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 目 录

## Contents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总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如何解释一个奇迹 /1

第二章 奇迹还是幻象：就业岗位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15

第三章 福利改革、制度理论和社会学习 /41

第四章 法团主义下的政策学习 /55

第五章 法团主义的重振：对外调整、工资节制和工会 /73

第六章 法团主义的失控：改变不需要工作的福利的急剧攀升 /111

第七章 法团主义的中断：通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曲折道路 /149

第八章 结论：荷兰经验的教训 /175

参考文献 /183

索引 /205

译后记 /217

## 第一章 如何解释一个奇迹

1986年,瑞典社会学家约兰·特博恩(Goran Therborn)出版了一部著作,它的名字颇具挑衅性,叫《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失业》。在书中,作者把他工作所在的国家——荷兰——称为“也许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就业失败国家”。在此两年之前,荷兰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创纪录的80万人,几乎占它的全部劳动力的14%。还有数量几乎同样多的工人通过残疾津贴和提前退休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计算,广义失业(broad unemployment)已经飙升到占劳动力的27%,这中间既包括找不到工作的登记失业者、残疾养老金受益者、提前退休者,也包括靠社会救济过活的人、参加政府支持的培训计划和公共用工联营活动<sup>①</sup>的人。在古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看来,欧洲大陆型福利国家是不需要工作的福利的典型,而荷兰则是他所提出的这一病理学典型中的典型。外国观察家嘲笑荷兰“抑郁沉闷,缺乏现实主义”,尤其是在“让100多万人由福利国家来照顾”方面<sup>②</sup>。荷兰病的说法使荷兰成为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昂贵而不可持续的公共福利政策的案例。

10年过去后,荷兰的各项政策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当国际社会在瑞典模式消失之后苦苦寻觅带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的新样板时,荷兰的“奇迹”在许多评论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各国的中央银行家和政治家纷纷赞扬荷兰把福利改革和财政保守主义同创造就业和维持整个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的做法。他们突出了荷兰的以下情况:荷兰人——男人和女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异乎寻常的比例、节制工资政策的持续、向

<sup>①</sup>用工联营(labour pool)是几家公司为调剂生产高低峰时不同用工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用工联营机制。——译者注

<sup>②</sup>[英]《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82年1月30日。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趋同标准的成功靠拢、社会动荡的稀少、社会政策改革的认同方式。他们不禁注意到,荷兰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将失业率减少一半的国家,从1983年的将近14%减少到1997年的6%<sup>①</sup>,远远低于欧盟令人沮丧的11%的平均水平。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把由财政整顿、福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认同和就业增长所构成的“荷兰奇迹”推荐给自己的同胞<sup>②</sup>。德国的政策顾问们已经被国内创纪录的失业、日益恶化的公共财政和福利改革的僵局搞得烦恼不已,现在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的“伟大的小邻居”,以寻找灵感<sup>③</sup>。比利时政治家呼吁工会和雇主向他们的荷兰邻居所树立的工资节制和认同政策榜样学习<sup>④</sup>。连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也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赞扬这个国家听上去奇特的左、右、中执政组合所体现的“通常亲密而默契的荷兰认同(……)这种认同促进了有效摆脱(significant departure)

①1983年的统计数据来自以登记失业数字为基础的老的失业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6年荷兰经济调查》(OECD, *Economic Survey of the Netherlands* 1986)巴黎,1986年,第44页,表18。从1988年起,失业统计以劳动力样本调查为基础。新老统计数字是不兼容的(这将在第二章进一步讨论)。

②[法]《世界报》(*Le Monde*)1997年1月23日;又见“荷兰模式”(Le modèle hollandais),载于《世界报》1996年12月2日;“幸福就在郁金香中”(Le bonheur est dans les tulipes...),载于[法]《新观察家》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1996年10月3日;更多的批评,见“荷兰的奇迹还是幻象”(Miracle ou Mirage aux Pays-Bas),载于[法]《外交世界》杂志(*Le Monde Diplomatique*)1997年7月。

③“伟大的小邻居”(Großer kleiner Nachbar),这一表述是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在其1996年7月25日《每周通报》中所采用的;又见联邦劳动力市场委员会主席伯哈德·雅戈达的文章:《荷兰模式——德国的榜样吗》,汉堡经济研究所《经济服务·经济政策》杂志第77卷第4期(1997年4月)(Bernhard Jagoda, ‘Modell Niederlande—Ein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in *Wirtschaftsdienst,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vol. 77, no.4 [April 1997])。关于荷兰和德国劳动力市场与政策的详细比较,见柏林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之一的贡特尔·施密特的文章:“荷兰的就业奇迹:荷兰与德国就业制度比较”,柏林经济研究中心讨论论文FS I 96~206 (Günther Schmid, ‘Beschäftigungswunde Niederlande. Ein Vergleich der Beschäftigungssysteme in den Niederlanden und in Deutschland’,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discussion paper FS I 96—206),又以英语发表,题目为:“荷兰的就业奇迹”,讨论文章FS I 97~202(‘The Dutch Employment Miracle’, discussion paper FS I 97~202)。

④与佛莱芒语区经济大臣埃里克·范龙姆皮(Eric van Rompuy)的谈话:“我们必须以荷兰为镜加以对照。”与比利时就业大臣米普·斯米特(Miep Smit)夫人的谈话:“以荷兰为榜样,但不要盲目。”载于《标准报》(*Standard*)1996年10月11日。又见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与政治》(*Samenleving en Politiek*)的讨论,它将其1997年3月号专门用于比利时和荷兰的比较。

衰弱的大陆模式的过程，后者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不断上升，福利国家陷入(财政)困境”<sup>①</sup>。

在以上引述中，“认同”和“摆脱”这两个词用得确实非常贴切，因为认同是荷兰社会和政治的一个令人熟悉的财富，这一点无论怎样说都不算夸大。荷兰的就业成就表明，荷兰已经摆脱了目前欧盟和不久前荷兰自己的失业痼疾。在就业强劲增长的榜样寥寥无几的西欧，在人们可能一致同意对消极福利国家的制度、社会和思想模式进行调整的迹象寥寥无几的情况下，荷兰的样板确实值得认真研究。

### 与欧洲的痼疾和荷兰沉闷的过去相比的成功

究竟有没有一个奇迹呢？我们的回答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荷兰告别了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迅速形成的不需要工作的福利的社会。表 1 用六大指标对荷兰的业绩与欧盟的平均水平作了一番比较。这六大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私人消费、投资、就业、失业以及净劳动力参与。显然，在过去六年里，荷兰在上述每个指标上做得都比它的欧盟伙伴好。这些成绩是在 1996 年将预算赤字减少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2%，达到经济与货币联盟 3% 的标准(1970 年的预算赤字为 3.8%；1980 年则为 7.2%)的情况下实现的。公共支出额已经连续 4 年下降，税收和社会保险收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随之下降。1996 年的这个比例是 44.4%(1970 年为 47.3%；1980 年为 57.2%)，在欧盟中仍位居第六，前几位分别是丹麦、瑞典、比利时、芬兰和法国<sup>②</sup>。1996 年整个公共债务减少到 78.5%。由于荷兰在过去 10 年里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低于 2.5%，所以它毫无疑问地将成为第一批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

表 1 荷兰与欧盟相比的经济业绩(1991~1996)

	荷兰	欧盟
国内生产总值	2.2%	1.5%
私人消费	2.3%	1.5%

<sup>①</sup>“太好了，是真的吗？”(Too good to be true?) [英]《经济学家》1996 年 10 月 12 日。

<sup>②</su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会计统计》各年(OECD, *National Account Statistics*)。



续表

	荷兰	欧盟
投资	1.3%	-0.2%
就业	1.5%	-0.5%
失业水平	6.2%	11.1%
就业/人口比率	64.2%	60.6%

资料来源：荷兰中央银行，《1996年年度报告》，阿姆斯特丹，1997年，第24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展望》，巴黎，各年（Dutch Central Bank, *Annual Report 1996*, Amsterdam, 1997, p.24;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various years）。

我们将在第二章研究关于“就业奇迹”的观点，我们会发现闪光的并非全是金子。就业率引人注意的增长过去出现过，现在依然存在：荷兰1983年以来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为1.6%。这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倍，而且像美国的“就业创造机”（machine of job）一样成绩良好。与美国相比，荷兰的就业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没有联系。荷兰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但它还能在以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一方，以英国和美国为另一方之间保持中间位置。然而，许多新的工作是非全日制的，有时只干几小时，不固定，鲜有职业发展前景；而且从事这类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参与率呈现显著增加，但是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即55~64岁之间的中老年男子的参与率已经降到欧洲国家的最低水平之一。再者，少数族裔和非技术工人就业机会很少，这使得就业奇迹的光环有所逊色，使社会整合和经济效益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的得分有所减失。

荷兰的变革即使是不全面的，也是深刻的。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仅带来了新变化，也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有些社会群体已被淘汰出局，或没有从最近的经济成就中获得好处。长期失业已开始减少，但几乎有一半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在一年或一年以上。从绝对量和相对量来讲，广义失业都有所减少，但是估计仍占目前劳动力的20%。一方面，新的工作岗位主要流向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技术较好的青年人；对于没有技术的移民工人来说，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其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另一方面，青年失业率20年来首次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现在为5.5%。简而言之，荷兰的就业成就和劳动力市场业绩是相对的，这一

方面是相对于荷兰刚过去不久的令人沮丧的情况来说的,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死气沉沉的表现来说的<sup>①</sup>。荷兰目前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目前的接近于非全日制充分就业的状态只能被看成是对失业问题的一个次优解。

### 寻找一个解释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相对的成功呢?荷兰存在同其他福利国家一样的结构性问题:要适应国际竞争条件的变化,适应产业变化、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医疗成本和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结构变化和生活方式个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Flora, 1987)。而且,荷兰也有与其他大陆型福利国家一样的消极遗产,即有对以男子挣钱养家的观念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稳定就业提供保护,对劳动排斥提供补助的强烈倾向(Esping-Andersen, 1990)。通常认为,福利国家是极其难以改变的(Esping-Andersen, 1994)。那么,荷兰的福利改革政治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

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的答案必须从问题难度、力量变化、制度、政治与理念的结合中去寻找。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将提出我们的政策学习理论,并在后面的章节中把它运用于福利国家的三个核心领域,即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第三章中,我们指出有一些办法来克服惯性的力量;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提出一个假定,即在荷兰经济中,法团主义形式不仅有助于贯彻雇主与工会中央组织商定的政策,也有助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决策方式和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接受“为他人考虑的”政策。不过,我们的模型承认,学习是受阻的,法团主义在阻碍一个政策领域的改革的同时,会组织力量支持另一个领域的根本改革。政策变革是国家和社会角色困惑(puzzling)与推进(powering)的结果,前者包括识别和界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后者包括对特定问题及解决办法的筛选给予授权并号召给以支持。

---

<sup>①</sup>[美]《华尔街杂志》(*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7年12月27日强调了荷兰对过去的糟糕形象的彻底扭转,并写道,现在似乎出现一个“新荷兰,它看上去令人吃惊地能干”。《欧洲人》(*The European*)1997年4月10日的文章“荷兰找到解决失业问题的神奇秘方”则强调荷兰与其他欧洲经济体的萧条表现相比的不同。